

邵盈午 邵振奇 编

语不 惊人 死不休

清末民初以来的雷人语录

東方出版社

策划编辑：亦 心
责任编辑：安新文
封扉设计：万有文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语不惊人死不休——清末民初以来的雷人语录 / 邵盈午, 邵振奇
编.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0

ISBN 978-7-5060-4077-8

I.语… II.①邵…②邵… III.语录-汇编-中国 IV.H13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41557 号

语不惊人死不休——清末民初以来的雷人语录

YUBUJINGREN SIBUXIU——QINGMO MINCHU YILAI DE LEIREN YULU

邵盈午 邵振奇 编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社**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6

邮购电话：(010) 65250042 65258589

印 刷：三河市金泰源印装厂

经 销：新华书店

版 次：2011 年 2 月第 1 版 2011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730 毫米×970 毫米 1/16

字 数：258 千字 印张：21

书 号：ISBN 978-7-5060-4077-8

定 价：38.00 元

前 言

从某种意义上说，所谓近代史，其实就是一部在改变其“自然状态”的同时也丧失其“古老”的历史；所谓的“自然状态”，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指的是一种高度自然和谐的“前习惯水平”，而“古老”则是指知识分子与传统文化的那种由来已久的契合关系。1840年的鸦片战争和1911年清朝的覆灭，这无疑是两个非常重大的事件，它意味着中国的帝国概念的崩溃，意味着“中国”作为一个文化、政治的概念突然变得模糊起来。

正是在这样一个内忧外患、新旧嬗替的时代，近现代知识者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遇之强敌”，往往不得不或明或暗地受制于一个特定的视界去思考各种问题——这个视界就是：中国的命运。

在清末民初，文化作为“现象”、“风气”和“潮流”的倾向十分明显。知识分子们亟于寻求出路，或主张坚守传统，或主张西化，太多的政治命题、社会命题、文化命题往往不暇深入讨论，转眼间就成为“话题”；各种治疗或解救“国之大弊”的药方匆匆开出，却根本无法应验……尤其是，在急剧动荡的近代中国，从未形成过一个文化上的共同规范；而且，由于普遍的愤激情绪，

愈是惊世骇俗的偏激言论就愈容易得到激赏和回应。

那确实是一个令人焦灼的时代——近代知识者面临着无穷的政治焦灼、文化焦灼、价值焦灼……

而这一切无不体现在他们所留存下来的话语之中。透过这些话语，我们不难发现：清末民初那一代人，远非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或勇于对一切既有价值作现代性“颠覆”，或“不识时务”地一味“抱残守缺”。也就是说，作为研究对象的近现代知识者，他们并非不具有丝毫的主动性，并非只是一个被外部力量所支配、随时代潮汐而沉浮的傀儡，一个个按照历史决定论的“模具”所浇铸的预定人格模型，但时下不少论者所采取的基本上还是福科所反对那种路数，即过多地强调历史的人为结构和意义，总是试图在时间轴上将复杂的历史现象重新排列组合以显示其“秩序”，以期通过主体的论析构建“系统”，彰显“意义”。这种“主观的历史”，固然满足了人们阐释历史的需要，却未必切合历史的本真面貌。其实，无论是历史本身，还是历史建构中的人，都是无所谓“系统”的，表面上的散乱无章、矛盾甚至悖谬，倒反而更接近历史的本相。职是之故，一味地将某种复杂的历史现象或人物的复杂的心态活动置于某种“结论”或必然性之下，必然导致那些在历时性的流变中成为杂揉了复杂的历史信息的文化存在的个体生命过滤为一个个定型化了的人物。所谓学术研究，也就沦为用“人”填充历史图表那样的表面化与简捷化，所谓“知人论世”之说原本包含的内外因互动统一也就蜕变而为单一的外因决定，这是非常可虑的。

当然，也有个别论者偶或触及到作为生命个体的人的复杂的内在理路，但作为研究对象的人的深层心态、人的全部丰富性和复杂性，又往往因了研究者的个人旨趣、个人经验以及思维模式、知识储备、理论视野、预定目标的局囿而不得不重蹈研究心态和固定结论的循环论证。试想，一个憎恶传统的人，能通过对历史的阐释推演出热爱传统的结论吗？质言之，如果史学家只是为了

给历史的“唯一性”作解释，那无异于将哲学的思辨之权交给了历史的本然存在。就历史本身而言，它往往比史学家的解释要复杂得多。对此，法国史学界提出了“年鉴学派”的理论，在他们看来，人们打量历史的眼光通常是短浅的，只是“短时段”的感觉；人们总是关心那些激烈的事件。其实，对于历史本身来说，这些事件只是“喧哗一时的新闻”，而真正影响历史的，是那种不太显眼、变化缓慢得多的事情；以故，他们提出了“长时段”、“中时段”的概念，并以此观照历史，这无疑是非常可取的。

话语，作为一种重要的历史资源，如何与当今的社会生活产生价值关联，如何通过话语重新找到与传统的“对应力量与智慧”？这无疑是一个迷人的课题。诚如罗兰·巴尔特所言，几乎所有的年表、编年史、汇编表现出的实在的“过去”，都是没有意义的，意义只存在于“组织完好的、流动性的话语中”，历史就在这种声音化或文学化中，才有了超越“固定”、“事实”的丰富性。（《历史的话语》，载《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中译本），92—94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这就是说，话语在读解历史方面有着其他文献所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如何保持个体言说与权力话语之间的张力，使个体的流动性话语成为一种观照历史的独特视角，遂成为笔者编纂此书的初衷。在笔者看来，透过话语，或许可以直接捕捉到人物最内在最本质的东西，从而使“触摸历史”有了细腻的纹路和立体的质感，它对读者所起到的效用，往往远胜于学者们煞费苦心的文字描述和学术论析。

下面不妨就此论题稍作延展。

话语本身不是教科书，不是历史文献，但它却往往比“历史叙事”更耐人寻味。它通常在“话题”中展开，而“话题”则在他们所生活于其中的那个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中展开，因此，必须将其置诸历史视野的思想、行为、习俗、制度之中，方能获得某种“同情之理解”。质言之，所谓话语其实就是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不同社会阶层的群体表现方式。在正史语境中，所谓二十四

史，不过是帝王将相的家谱，诚如梁启超所揭露的那样，“为亲者讳，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举凡一切有悖于统治集团利益的言论皆在“讳”之列。所谓“历史”不过是胜利者用以解释胜利的合理性、必然性的重要筹码而已。

而本书所收录的这些话语，大多散存在人物的日记、笔记、年谱、书信及其他传记资料中（史书往往不予著录）。透过这些话语，我们不仅看到在历史上确实不乏“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鲁迅语），还会发现一种具有“深层结构内容”的东西。如果说，一种话语是智慧的而且对历史构成了一种独到的阐释，那么，在收录此书的某些话语背后，显然透发着话语之外的玄机，潜藏着一部未及展开的历史，说不定就隐涵着历史的某种走势与取向——这正是话语的魅力所在。记得清人焦循曾云：“按古人各生一时，则其言各有所当。惟论其世，乃不执泥其言，亦不鄙弃其言，斯为能上友古人。”（《孟子正义》，中华书局，1998年，第727页）这位终身不仕、专研经学的名儒的上述见解，倒是颇有几分“历史相对主义”的色彩，亦接近西方诠释学中对理解之多样性的主张。但也应当看到，随着岁月的流逝，某种特定的“语境”一旦成为历史，处在当时历史潮头中的那些卓越人物，其学问之渊博，节操之高峻，理想之宏远，胆气之雄伟，意志之坚韧，感情之丰富，其话语的“各有所当”，将无法为另一历史情境中的人们感同身受地深切感知。有鉴于此，我们一直将兴趣锚定在处于新旧嬗替之际的近现代人物的“心态”这一维度上，并以此作为阐释视角。窃以为，这种“有意为之”可以由单一的“论世”转入“知人”，将一般的群体扫描转入对个体的重视，由宏观审视转入微观体察，易言之，宏观时势会辐射在每个个体身上，但它在每个个体心灵的投影和烙印则是千差万别的。随着他们所处的那个历史时代无边地后退去，历史也许只剩下历史学家们指给我们看的一堆堆事件、人物、道具与摹本。至于那些并非像黑格尔所说的用逻辑与历史相

统一这样的可以“一网打尽”的丰富性与差异性，往往被“历史权力话语”与“现代化叙事”所遮蔽。而真实的情况或许是，那些煊赫一时的历史人物，其名字早已被重重叠叠地淹没在时光的波涛之下，他们的痛苦和欢欣早已杳然无迹。苍天无语，他们的秘密也许根本就是无法破解的。作为后人，我们的读解充其量只是满足了我们认知上的一种需要。既然如此，所谓阐释，是否只是阐释者对自身的一种阐释呢？

本书将清末民初以来知识分子的话语，按照其性质略加划分，为名语、智语、赞语、狂语、愤语、慨语、断语、辩语、警句、誓语、异语、质语、仁语、妙语、谏语、挽语、凄语、谦语、豪语、讥语、诲语、趣语、省语、忆语、詈语、谐语、雅语，凡27类（这种体例并非我们的独创，而是依循明人曹臣《舌华录》，只是比《舌华录》多出9类），这种“依循”并非简单的“仿制”，而是通过这种分类，更充分地显示出近现代众声繁会、气象万千的话语景观（同时也是出于方便读者根据各自的“性之所近”加以选读的考虑）。

收入本书的话语大多指涉了信仰、自由、反抗和牺牲，皆为被时下的知识分子所日益轻忽的主题。这些话语，像一束束不朽的心灵火焰，历久常新地映照着重现代知识者坚毅的面容。尽管时殊世易，尽管他们身逢乱世，无可避免地烙上了时空的印痕，但那些穿透历史的不朽声音依然激荡心魄，那些子规啼血般的精诚吐诉依然令人动容，那些闪烁着个性自由与人性尊严的精妙言论依然铿锵有力。如果说，“历史叙事”掺杂了太多的个人色彩的话，那么，话语的最大魅力就在于为我们重现了那些被“历史权力话语”与“宏大叙事”所无端切掉的“活生生的个体”；由话语所构成的阔大时空，呈现出历史绝非一种面目，而是与其他面目处于不同的时空维度中，或处于时空的潜在的可能性中，借用后现代主义的概念，话语时空所构成的开放性，正是对“正史”化空间的“解构”、“颠覆”与“瓦解”；具体说来，对于一个重

大的历史事件，它可以是瞬间描述，全景透视，也可以是私人叙事，感性复原，通过话语去“触摸历史”，既可避免“宏大叙事”所带来的某些缺陷，又能够通过这种“开放性文本”打破固定的理论解释框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甚至修正了人们对历史的固有认知。如本书所选录的“警句”部分，宛如寒光四射的宝剑，出匣自鸣，出语惊人，往往具有振聋发聩的巨大的理性力量。而“狂语”部分，发话人皆为个性上锋芒毕露的人。所谓个性，乃激情的骄子，是一种强有力的姿态，它固执地面对来自外部的挑战而义无反顾地作出自己的独特回应。返观我们自身，长期以来，经过社会集体的文化与教育的反复强化，我们不但高度认同我们所扮演的无个性的角色特别是被位置和身份所固定下来的角色，而且早已被社会与自我认同了的那种习焉不察的话语方式。又，我们虽然在物理时间中进入了21世纪，从物质文明的层面看，人类也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但从精神上看，人类在许多方面却是悄悄地退化了。多少人生活在丧失了理想与信念后的琐碎实践和纯粹功利性的随机追逐之中，既缺乏传统的虔诚，也没有了诗性的想象，更谈不上傲世独立的个性。至于“忆语”部分，收录的则为个人对往事的言说（相对于集体性的“大历史”而言，它属于个人化的“小历史”），当属活体的历史，是亲历者的历史，较之后来的史学家，这种具有“在场感”的话语更配授以“真实”与“真相”的名称。不过，须加措意的是，历史一旦进入“回忆”中，事件未必是现象学意义上的原生事件了，其原真性往往由于这种个人性言说的有目的的能动作用，而遭到扭曲、变形，甚至会偏离记忆中的原貌，因此，此类“忆语”必须与原始报道、相关的历史文献相参照，方能发挥其接近历史的规定情景的作用。再如本书中的“省语”部分，收录了不少陈独秀与瞿秋白的话语，殊堪玩味，从中颇能窥出历史建构中的人的复杂心态。记得德国的阿多尔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尝谓：“只要有人被当作牺牲品，只要牺牲包含了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对立，客观上牺牲中就包含了

欺诈。”妙哉斯言。历史的实际操纵者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历史语法”使它走上“正确”的方向来为自己服务，所谓“历史真理”不过是胜利者用以解释胜利的合理性、必然性的重要筹码而已。这一点仅从陈独秀的那些“不合时宜”、铮铮作响的言论中，足徵此论不虚。惜乎这种声音在时下已变得异常稀缺。“辨语”、“断语”部分，所收录的话语大多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这种“个人色彩”如果将其置放于整个学术界被国家话语权力所掌控、任何个人话语在进入公共空间之前遭到扼制的语境下，就显得难能可贵，像陈寅恪一再标举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意志”，实际上就是要努力建立一种独立的叙事模式，一种个人化的话语价值体系，并最终将此转换成一种在“公众”、“公正”意义上的完全敞亮的对话。相比之下，当今学界（尤其是所谓“学院派”），在学报语体支配下的学术叙事，总在利用艰深晦涩的学术语体，依靠各种超验的知识术语，维系话语威权，泡制出大量与公众隔绝的自闭性文本。这类文本由于丧失了人文鼓吹与文化批判功能，其价值是颇为可疑的。再者，近现代知识者在政治与学术、对自由境界的向往与革命之间始终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在这方面，被誉为近代“舆论界之骄子”的梁启超与接受过传统文化与近现代精神沾溉的瞿秋白便是一个精彩的个案显示，其《多余的话》在在表现出处于“血与火”的革命中的种种不适应的复杂心态。他的“死”，固然满足了伤感的个人主义者“大休息”的愿望，同时也满足了革命的历史伦理叙事的需要（历史伦理叙事常常以它的“必然性”豪情，使所有人对它采取臣服的态度）。可他在就义前所吐露出的诸多“省语”，未尝不隐涵着深刻的内心隐痛。限于篇幅，在此恕不对本书的各类话语逐一介绍。

这部书虽说是“编”的，却未必比我们所“著”之书少费气力，我们之所以不惮烦劳，罄力于此，未尝不是基于一种“拒绝遗忘”的真诚努力。同时，也是基于这样一个重要发现，即在这种话语资源与历史解释、叙事模式之间，往往存在着惊人的差异。

因此，我们力图为读者提供一种重新解读历史的新视角，以期达到读史与阅世的互动。作为一种历史性的存在，我们希望这些话能够穿越时空的藩篱，持久地对我们全面认识历史，对我们的人格塑造、存在方式持续地产生影响，并在我们“拒绝遗忘”的深入思考中转化成智慧和力量的巨大资源，让我们的生命由飘忽变得坚定，由偏狭变得博大，由稚嫩变得成熟。当然，限于水平与学力，我们的这一初衷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殊不敢自是；毕竟，这是一项尝试性的工作，定然存在着不少缺憾，在此恳请读者不吝批评。

庚寅年秋月邵盈午、邵振奇撰于古彭寥兰簪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前 言	1
第一：名语	1
第二：智语	10
第三：赞语	31
第四：狂语	43
第五：愤语	51
第六：慨语	60
第七：断语	87
第八：辩语	103
第九：警语	113
第十：誓语	122
第十一：异语	129

第十二：质语	151
第十三：仁语	168
第十四：妙语	175
第十五：讷语	192
第十六：挽语	199
第十七：凄语	209
第十八：谦语	215
第十九：豪语	222
第二十：讥语	232
第二十一：海语	242
第二十二：趣语	255
第二十三：省语	270
第二十四：忆语	284
第二十五：冒语	298
第二十六：谐语	307
第二十七：雅语	316

第一：名语

李鸿章曾言，清王朝面临的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遇之强敌”。

1842 至 1843 年间，魏源受林则徐嘱托编成《海国图志》，对“夷情”作了详细介绍，特别是制造轮船火炮之术、练兵养兵之法，并明确提出攻克西方侵略者的策略是：“调夷之仇国以攻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未款之前，宜以夷攻夷；既款之后，则宜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彼时，国中无人附和，是书思想可谓隐而不彰；倒是传入日本后，发用盛大。无怪乎日本学者为此大发感慨：“呜呼！忠智之士，忧国著书，不为其君用，反为他邦。吾不独为默深悲，抑且为清主悲也夫！”

1898 年 4 月，康有为在广东会馆发表演讲：“吾中国四万万人民，无贵无贱，当今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他血脉愤张地疾呼道：“今日人人有亡天下之责，人人有救天下之权！”

1903年，邹容写成《革命书》，他宣称革命是“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革命是“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伟大行动。他认为献身革命是每一个人不可推卸的责任，无论老年、中年、壮年、少年、幼年，无论男女，都要“相存、相养、相生活于革命”。

孙中山说：“革命之名词，创于孔子。中国历史，汤武之后，革命之事实，已数见之不鲜矣。其在欧洲，则十七、十八世纪以后，革命风潮遂磅礴于世界，不独民主国惟然，即君主国之所以立宪者，亦革命之所赐也。”

1917年1月9日，北京大学举行开学典礼，蔡元培发表就职演说，此即著名的《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蔡氏与北大学生约法三章：一是抱定宗旨，“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二是砥砺德行，“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己，更必有心励人”；三是敬爱师友，“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至于同学共处一堂，尤应互相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

1923年1月29日，孙中山在《申报》五十周年纪念专刊上发表《中国革命史》一文，他说：“从事革命者，于破坏敌人势力之外，不能不兼注意于国民建设能力之养成，此革命方略之所以必要也。余之革命方略，规定革命进行之时期为三：第一为军政时期，第二为训政时期，第三为宪政时期。”

自辛亥革命以来，鲁迅经历了太多的“革命”，他往往将这种“革命”视为假革命。他认为：革命前是奴隶，革命后反而成了奴隶的奴隶了。因此，他主张一切都得从头来过，应有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他反对把革命描述为非常可怕之事，“摆着一种

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他强调道：“革命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

胡适说：“革命往往多含一点自觉的努力，而历史演进往往多是不知不觉的自然变化，因为这方法上的不同，在结果也有两种不同：第一，无意的自然演进是很迟慢的，是很不经济的，而自觉的人工促进往往可以缩短改革的时间。第二，自然演进的结果往往留下许多久已失其功用的旧制度和旧势力，而自觉的革命往往能多铲除一些陈腐的东西。在这两点上，自觉的革命都优于不自觉的演进。”他坦言：“我们是不承认有什么根本解决的。世界上两个大革命，一个法国革命，一个俄国革命，表面上可算是根本解决了，然而骨子里总逃不了那枝枝节节的具体问题；虽然快意一时，震动百世，而法国和俄国终不能不应付那一点一滴的问题。我们因为不信根本改造的话，只信那一点一滴的改造，所以我们不谈主义，只谈问题；不存大希望，也不致于大失望。”

曾国藩在家书中说：“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

第一个提倡“自改革”的是龚自珍，其名言：“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所谓“史”，从广义上说，亦即国学——吾族所传承积累之文史哲学。可龚自珍却未曾预见这个历史的悖论：“去其史”者最积极的，竟是中国人自己。

王茂荫是晚清朝中为数不多的精通经济问题的官员，他敏锐地认识到货币的价格和价值相分离的特征，并上升到“以实论虚”

的理论高度，即坚持货币的金本位。他是《资本论》中唯一提到的中国人。他有一句名言：“官能定钱之值，而不能限物之值，钱当千，民不敢以为百；物值百，民不难以为千。”

孙家鼐说：“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

张之洞说：“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

康有为有《草堂示诸子》诗云：“圣统已为刘秀篡，政家并受李斯殃。大同道隐礼经在，未济占成易说亡。良史莫如两司马，传经只有一公羊。群龙无首谁知吉，自有乾元大统长。”

鲁迅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

王国维说：“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章者，殆未之有也。”

新文化运动时，柳亚子响应反孔言论，主张“非孝”，说父子应以兄弟相称。他写诗给儿子柳无忌：“狂言非孝万人骂，我独闻之双耳聪。略分自应呼小友，学书休更效尔公。”他还进一步主张废除伦常，在一首诗中说：“共和已废君臣义，牙彗羞他说五伦。种种要翻千载案，堂堂还我一完人。”

五四运动时，年甫而立的李大钊对世界充满了乐观的展望：

“只要你心中的光明不灭绝，世间的黑暗终有灭绝的一日，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康有为写出《大同书》后，秘不示人。他解释说：“方今为‘据乱’之世也，只能言小康，不能言大同；言则陷天下于洪水猛兽。”

蔡元培自述：“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

陈独秀为《新青年》撰写发刊词，内云：“……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自觉者何？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而自视不可卑也。奋斗者何？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视之若仇敌，若洪水猛兽，而不可与为邻，而不为其菌毒所传染也……”

鲁迅在《灯下漫笔》中说，中国历史上只有两个时代，一个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一个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五四期间，陈独秀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提出“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稍后，谈到“政治的民治主义”的时候，他又重申：“我们既然是个‘自由民’，不是奴隶，言论、出版、信仰、居住、集会这几种自由权，不用说都是生活必需品。”

陈独秀认为五四运动特有的精神有二：一、直接行动；二、牺牲精神。

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参加，总参议胡汉民代表孙总理宣读训词：“三民主义，吾